

2012 年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年会会议综述

徐亚娟*

2012 年 10 月 31-11 月 4 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 2012 年年会在西安召开。会议以“城市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为主题,参会的有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海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云南、辽宁、黑龙江、吉林、香港、台湾等 21 个省市区 50 余所高校、科研单位、出版机构的 60 余名学者。会议收到 50 余篇学术论文,共有近 40 名学者做了大会发言,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城市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and 作用、丝绸之路与城市兴衰、民族迁徙与城市发展、古代东方与西方的城市及其他等五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此将与会论文加以概括总结,与大家分享。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市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石云涛在《楼兰城在中西交通史上的地位——斯坦因楼兰古城考古的历史发现》中对斯坦因楼兰考古的成果略加概述,对斯坦因楼兰考古的结论和经验逐一做了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耿昇在《〈伯希和西域探险日记〉中关于库车绿洲古代文明的记述》中介绍了伯希和的几本西域探险日记及一些书信,对其中关于库车绿洲古代文明的记述做了详细介绍,为我们提供了古龟兹研究的重要资料,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北京语言大学钱婉约、贾永会对石田干之助《长安之春》为中心,论述了文化交融下的唐代长安盛况。

二、丝绸之路与城市兴衰

这一主题的论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靖国的《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城址的分布与选择》为代表,论文讨论了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城址的分布与选择,考证了设置军城的

* 徐亚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组。

意义，认为后来的许多郡县都是由军城转化而来，这与军城所设的位置有关，并分析了不沿用的原因，认为是成本选择的原因。

三、民族迁徙与城市发展

这一主题的论文比较集中，共计 18 篇。主要有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在其《移民与丽江古城及其多元文化的形成》中，从移民的角度介绍了丽江古城多元文化形成的过程和原因，认为丽江古城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多民族共居、互补、相融的边境城市。汉、藏族移民及其文化对丽江古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该地不是纳西族被汉族同化，而是汉族被纳西族同化，汉文化与纳西族文化很好地交融在一起。另一位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家骥在其《云南省城市民族关系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提出云南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问题，民族关系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韩香的《隋唐时期入华的中亚胡人的职业阶层与活动舞台》以外来移民集团为中心，从移民的角度探讨了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认为长安作为国际大都市，具有极大的包容力、开放性，为外来移民提供了自由的活动空间，使外来移民能够迅速融入，从而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内容。

广西社会科学院古小松的《中原移民与安南城市》以赢𡗗为例探讨了中原移民与安南城市的发展问题，指出汉文化在越南根深蒂固，虽然汉化的色彩在近代以来有所淡化，但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越关系的发展，如何看待历史和面对汉文化，日益成为越南国家、民族、百姓的重大课题。

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俞祖华的《从渔村到港城的转身——近代烟台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文化的形成》介绍了近代烟台的城市化进程，认为烟台城市化形成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汇的结果，并对近代烟台城市文化发展过程形成的三大文化品牌：开埠文化、葡萄文化和红色文化作了介绍。

福建社会科学院陆芸的《唐代的胡人、胡商与城市发展、城市文化》从相关的记载探讨了胡人、胡商与城市发展、城市文化的关系。并联系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建设，提出了城市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认为要以原生态历史文化为基础，构建特色人文城市。

新疆社会科学院吐娜在《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与博尔塔拉城镇格局的形成》一文中，认为察哈尔迁入博尔塔拉、塔城等地后与相机迁入的各民族友好相处，增强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了新疆的民族融合的进步作用，特别是对新疆近代多民族格局的形成

有重大意义。另一位贾秀慧在其《近代新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对近代新疆的城市化中的城乡关系进行了讨论,认为由于交通闭塞,封建的政治、经济羁绊及战乱的影响,其城市近代化的总体进程时断时续、曲折泥泞。整体发展水平低下,发展速度缓慢。但不可否认近代新疆的城市近代化具有鲜明的进步意义,会在全疆范围内起到一定的辐射和聚集的效应。

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提交的《莫斯科“中国城”和“中国城墙考”》对莫斯科的“中国城”和“中国城墙”做了介绍,认为它的命名并不是直接和中国关联,是要用“中国”替代声名狼藉的“鞑靼”;同时因为时代变化,中国城墙也逐渐失去了修建之初的军事防务意义、中国城也减弱了贵族色彩而趋向于工商业。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阎根齐、曹雅莉的《论海南古代城市的起源、演变与发展特征》认为海南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从城市的起源,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过程,走过了与内地城市截然不同的道路,体现了独特的历史文化特征,是中华民族多元化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师范大学的刘进宝在其《敦煌归义军政权的商业贸易——从敦煌到甘州、西州、伊州、于阗的出使贸易》中通过对敦煌到甘州、西州、伊州、于阗的出使贸易的文书考证,认为归义军时期的敦煌虽然缺乏商业经济,并非没有交换,当时敦煌的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使团进行的。

敦煌研究院的胡同庆提交的《敦煌壁画中的城市、住宅及卫生设施》从社会生活史的新角度对敦煌壁画中的城市和住宅图像进行探讨和介绍,认为敦煌壁画中所描绘的城市、住宅及卫生设施等图像,不仅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状况,同时对于正在高速发展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或许有参考借鉴的意义。

四、古代东方与西方的城市

海南师范大学张一平的《海南文化的自然主义特征及其历时性结构》纵向地分析海南文化结构,将海南文化的历史演变分为四个时期,并指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文化主导,认为海南文化的本质是自然主义特征,指出其未来发展趋势应该向海洋文化方向发展。

中国社科院万明的《昙花一现之城——全球化开端时期的明代舟山双屿》对明代双屿港城做了探讨,认为它是中国最早形成的一大国际自由贸易商港。虽然只是昙花一现,但在中外海上贸易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贡舶到商舶转型阶段的一个关节点,见证了中国与葡萄牙乃至全球化开端时国际海上贸易引人注目的发展历程。

陕西师范大学吴洪琳以统万城为研究个案，讨论了城市与军事文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问题，认为统万城是民族交融的典范，既是北方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农耕民族影响的产物。既体现了汉文化的特色，也兼顾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习俗。

齐齐哈尔社会科学院孙文政的《蒲与路故城的考古学考察》根据零散的史料与实地考古踏查，详实地论述了蒲与路故城的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建筑形制、建城时间、族属等问题，认为蒲与路故城应该建于410年，北夷索离国时期，建城者应为索离人或豆莫娄人。

中央民族大学彭博的《清代前期安多地区的城镇与市场》对安多地区的中心城镇、军事城镇、寺院城镇、商业城镇丹噶尔做了探讨，认为安多是一个经济、文化形态、民族特点繁杂错置且相互影响补充的地区，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应该占有独特的地位。

伊犁师范学院的李建平在其《试论清代新疆卡伦》中通过对史料中相关记载的梳理，对卡伦的职责、任用、管理、设立、作用几方面进行了探讨，认为卡伦主要设立在生活方便的地区，远离边界，不但未能对边界的拓展起到积极作用，反而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另一位学者唐智佳的《城堡即家园——清代伊犁锡伯营八牛录城堡研究》通过史料和实地踏查对清代伊犁锡伯营八牛录城堡的概况、选址、功能、影响做了研究，认为，它既是军事堡垒、自我防护之所，也是日常生活的安息地、生产基地，同时也是相互联系、保护的纽带。

西北民族大学朱悦梅的《唐代吐蕃城堡及其府第》认为吐蕃时期的城是在城堡、宫殿、堡寨等形式的基础上，形成的以部落制为基础的城居聚落群，并初步具备了城居范围扩大、府库功能突出和简单商业功能等城市化因素。但城市社会特征还不明显。而且吐蕃城市的基本职能与演变轨迹也不同于中原王朝，其经济、交通要素并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五、文化交流及其他

这部分的论文主题比较分散，但值得重视者却不少。如山东省蓬莱市登州博物馆袁晓春、张粤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商与福船》讨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商与福船、蓬莱船材与郑和下西洋的关系，为研究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及对外贸易提供了资料。并介绍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创办，与张謇的关系。认为当年的博物馆建设虽然是传教士带来的辅助传教手段，却启发了大批的晚清有识之士，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建设的序幕，引领了中国近现代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名誉会长陈佳荣的《拂菻、佛郎机和化人》根据语言学和史料记载认为化人应为佛郎机人。并介绍了自己关于钓鱼岛的两篇文章，提出根据史料记载，考证了

最早记载钓鱼岛的是中国人，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赐给琉球的闽籍船工《三十六姓所传针本》有四处记及“钓鱼屿”等名，并为琉球人程顺则《指南广义》(康熙四十七年，1708)所确载，是为关于钓鱼岛最早、最可靠的信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泓的《古代西方文化传播的本土化问题》以东北亚地区出土的大量具有西方特色生活器皿为中心，从器型、纹饰方面、材质三个方面探讨了古代西方文化的传入东北亚地区及其本土化的问题。认为其发展过程分为原始状态——初传中国——中国化——初传朝鲜半岛日本——本土化等，经历了仿制、改造、创新三个阶段，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地区化，一是民族化，使其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多元性。

复旦大学许全胜的《秦人与西戎——解读清华简》利用最新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相结合，对秦人和西戎的关系做了考证，认为早期秦人来自东方，后迁至西部，抵御戎，奴且应为卜辞中的且方，且人为咋人的祖先。

浙江理工大学莫小也提交的《澳门艺术与中外民族文化交汇》对澳门艺术做了介绍，认为澳门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头堡，在近现代视觉艺术发展历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山东艺术学院李丕宇对中国近现代各种“洋风建筑”做了介绍，认为它们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是近代中国屈辱历史的见证，是建筑文化从碰撞到融合的实例，是中国建筑走向现代形态和风格的实践过程，是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遗产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宁夏社会科学院薛正昌提交的《须弥山石窟与藏传佛教造像》对明代圆光寺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并推断，须弥山石窟藏传佛教造像、藏传佛教造像壁画的年代，早期应该在元朝安西王时代，最晚也是在明代初年。

苏州科技学院祝曙光讨论了铁路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认为铁路对日本的经济、物流、人际交往以及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普及、社会风气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与标志之一，同时它也影响和推动了日本近代化的发展。铁路延伸是与日本近代化的深入同步而行。

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易华提交的《秦与大秦》从生产经济、政治法律和军事战争三方面概要地论证了波斯帝国和亚历山大帝国对秦王朝的建立产生的影响。

广州博物馆程存洁的《道光十二年广利洋行商人卢文锦卖铺店考》对新发现的四份关于道光十二年广利洋行商人卢文锦卖铺店契约文书进行了个案考证，认为十三行行商的兴衰主要取决于清政府的政策和态度。

宁夏大学张天政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期刊、杂志中西方学术界对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文章进行了综述和介绍，认为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与日本不同，中国学的是思想、日本学的是技术，中国文明主要是自己创造的，在与西方文化交流中也不断吸取营养，丰富、完善自己的文化。

此外还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谢贵安《少数民族政权汉化在史学活动中的表现——以〈清实录〉修纂为中心》，国家图书馆徐亚娟《早期西方传教士与澳门印刷出版活动钩沉》，郑州大学高凯的《从中印的交流史蠡测麻风病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何岩巍《试论耶稣会“适应政策”的来源决疑论在对华传教过程中的体现》等多篇论文，鉴于篇幅，兹不一一赘举。

小结

此次学术研讨会规模适中，由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双方合作默契，会议日程安排紧凑严密又不乏交流沟通的机会，受到与会代表一致好评。

会议提交的论文都是各位学者近期研究成果的结晶，内容集中于城市与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的研究，涵盖文化史、政治史、交通史、宗教史、军事史、历史地理、考古学、医学等诸多领域，既有综述性论述，也有个案研究。

本次研讨会充分发挥了跨学科、跨学界联合研究的优势，全国中外关系史专家、学人齐聚，共同分享自己近年的学术成果，尤其在城市与古代中外民族文化交流史研究方面，不少参会论文为大家公布了许多新文献、新发现、新视角，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此次研讨会是对国内学界中外城市史、中外交流史及移民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